

医学与国际关系



第
二
十
三
辑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医学与国际关系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
二
十
三
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医学与国际关系/秦倩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23辑)

ISBN 978-7-208-15593-0

I. ①医… II. ①秦… III. ①医疗保健事业-国际关系-研究 IV. ①R19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82087 号

责任编辑 赵荔红

封面设计 王小阳 夏 芳

•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第二十三辑 •

医学与国际关系

秦 倩 主编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23.25
插 页 2
字 数 346,000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593-0/D·3329
定 价 78.00 元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FUD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23/2018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三辑 / 2018 年

FUD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23/2018

主办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主 编： 秦倩 徐以骅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拼音或字母排序）

Callahan, William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樊勇明 复旦大学

冯绍雷 华东师范大学

黄仁伟 上海社科院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

Lampton, David 美国霍布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秦亚青 外交学院

沈丁立 复旦大学

石之瑜 台湾大学

Telò, Mario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ULB)

王正毅 北京大学

杨洁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

郑在浩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

Zweig, David 香港科技大学

编辑委员会（以姓氏拼音排序）

包霞琴 薄 燕 陈玉聃 陈玉刚 陈志敏 何佩群 黄 河

黄以天 蒋昌建 秦 倩 苏长和 孙芳露 沈 逸 吴澄秋

肖佳灵 徐以骅 俞沂暄 郑 宇 张建新 张 骥 朱杰进

编前语

秦 倩

我们往往不能详尽地了解整个医学史,因为医学领域疾病的概念相当复杂且令人费解,其确切定义不仅因时空变化而暗中偷换,而且不同社会群体对疾病(disease)和病痛(illness)的认识,及其起因和意义均有不同的看法,经数千年时光的淘洗久受浸润至今仍然执守这种信念。古代用以预防病痛的信仰和实践出自特有的文化,并与民众信守的社会、道德和精神理念一脉传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医学”(traditional medicine)这一概念涵盖范围广泛的各種地方性医学,这些地方性的治疗方法和实践在各国、各地区呈现不同的面貌,但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19世纪以后插上科学翅膀、重实证的现代西医学判然有别。

实际上,西医学最初也是一个地方性医学,而且与其他社会的民族医学相比,产生更晚。当漫长的中世纪(5—15世纪)时,欧洲受教会统治,基督教作为“神圣的帷幕”侵入并垄断社会关系,为包括疾病在内的一切领域提供解释。在天主教的大一统下,疾病被视为上帝对人的惩罚,治病疗伤被视为是违背上帝的意志,所以天主教会禁止医学研究。直到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社会才开始摆脱宗教的束缚,推动“人本主义”的兴起与科学的发展。1543年,维萨里出版《人体之构造》一书,为现代生物医学体系的初创奠定学术基石。17世纪科学进一步发展,启蒙运动使它广为传播。但此时科学对医学的影响与贡献尚微。指针就这样匆匆指向了19世纪,直到这个世纪才是真正的科学时代,西方各大国和各个大学系统性的奖励科学进步和设立科学基金,才使医学和科学紧密结合起来,促使现代西方医学高歌猛进。科学不断向医学领域渗透,细胞病理学说及细菌

学的发展对疾病原因提供了更准确的说明,化学研究带来了麻醉药和消毒剂的发明,使得外科手术成为西医的强项,手术所依托的医院开始彻底的现代转制。同时,药理学的发展推动了制药业的进步,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计以及一系列光学器械的应用推动了临床医学的发展。至今仍在刊行的医学界权威杂志《柳叶刀》(*Lancet*)也在1823年问世。这些合力促使科学医学的体系形成。

19世纪,西医学完成其科学化、系统化之后,随着西方殖民统治与海外贸易、以及基督教传教的带动下,也日趋全球化。诸如早期的英国、西班牙、荷兰,以及后来的美国等在本土之外谋求军事、经济或势力扩张的国家,无一不关心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流行疾病的影响范围,唯恐这些“热带疾病”害及本国在外的政客、商人和教士。因此,像东印度公司一直设有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医疗机构,当英国殖民政府镇压了1857—1858年印度反英暴动(*the Indian Mutiny*)从而牢固控制印度后,该机构转型为印度医疗服务中心。在这一过程中,“西医”(western medicine)相对亚洲、非洲和美洲等地的传统医学始终保持高度优越感,一些按西医思路设计的医学院和医院得以建立并旨在培养当地居民。而传教士们在东向传教的时候,随身携带的除了《圣经》还有药品甚至显微镜。这些西医传教士初履东土就承担着“宗教”(基督教)与“科学”(医学)两种职能,负有双重的教化使命。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进入20世纪初期,“宗教”与“科学”双重功能中宗教成分在消退,科学层面却在不断凸显,由此在东方社会创造出了一个“现代医疗殖民”(imperial medicine)的新空间。

换言之,西方医学的传播与西方现代帝国勾画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大规模扩张的路线图之间构成了相互对应关系,这使得原本局限于西方一隅的西医学被持续地输入非西方地区,“欧风美雨,驰而逐东”,冲击并取代各地方性医学,不断建立科学医学的权威地位,全球同此凉热,也因此对世界医学格局及人类健康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这一波西潮挟其威势卷地而来的情况下,出现了跨文化语境下不同医学的对峙。我们知道,医学并不是一门纯粹的科学,它所受到社会人文因素的影响要比自然科学大得多,在其发展过程中,有时被地理环境、社会伦理、文化价值取向等人文因素影响与塑造,由此形成世界范围的疾病认知与治疗实践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在疾病认知上,一种文化中的疾

病在另一些文化中可能不被认为是疾病,甚至被视为健康的表现。比如,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文化都不把肠道寄生虫看成是疾病,只有当寄生虫引起呕吐、窒息或其他不适时,才需要由医生予以治疗。

在疾病的认知基础上,很多社会关于疾病的发病学原理也有巨大的文化差异。早在《内经》时代,中医学就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建立了自身的病因学理论,认为外邪、七情、饮食劳倦诸事都会成为危害人体的致病因素,而先天因素、外伤及寄生虫等也可能是疾病的原因。在《内经》之下,东汉张仲景《金匱要略》将病因分为内所因,外皮肤所中和房事、金刃、虫兽所伤三大类,成为《内经》病因理论之补充。在此基础上,后来宋代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正式提出了著名的“三因论”：“凡治病,先须识因,不知其因,病源无目。其因有三:曰内,曰外,曰不内外。内则七情,外则六淫,不内不外,乃背经常。”

显然,中医学除了关注外邪,还把疾病归因于人体正气或情绪的作用,并在病因学解释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相应的疾病预防与治疗体系,这一点与西医学迥然不同,呈现出巨大的跨文化差异。

在跨文化背景下,不同地方性医学各有特色是不言而喻的。新大陆发现后的很长时间内,西方人也承认这一文化差异的存在。当欧洲人看到亚洲的草药治疗、印第安人的萨满仪式等,凡此种种皆与自己当时所持的以体液病理学为主的疾病观完全两异,但也尊重这样一种治疗实践,尚未别尊卑、分贵贱。比如,明末清初早期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对中国医学就有臧有否。他们对中国医术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人精细的把脉诊断方法。除了西来的传教士,那些浮海东来的西方医生和博物学家也关注中医典籍的翻译。德国人克莱耶(Andreas Cleyer)作为为东印度公司服务的医生,1682年出版译著《中国临床》,书中节选了《王叔和脉诀》《脉经》《难经》和《黄帝内经》等中医经典。英国医生福劳业(John Floyer)正是受此书启发,发展出一种结合西方和中国诊脉经验的诊断新方法。大致在这一时期,传教士和受其影响的西方人还是乐于向中医学习的。^①

不过到了19世纪后期,由于细菌学在欧洲医学上的成功,以及传教士

① 陶飞亚:《传教士中医观的变迁》,《历史研究》2010年第5期,第61—62页。此类研究亦可参见高晞:《地理大发现后的中医西传》,《文汇报》2015年9月11日,第W10版。

所持的“文化沙文主义观”，后来者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传统医学成为西方人眼中的“巫术”，甚至可与星相巫祝之流的“迷信”事务并列，西医与传统医学的对比被转换成新与旧、科学与不科学、先进与落后的对立。西方的生物医学挟其话语霸权随着西方殖民统治者和传教士的脚步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个过程造出了成批不断流动的西方人，这些东迁的西方人先是在北美大陆、澳大利亚等地，比照本国模式建立起新社会，西医体制也随之移植过来，本土医学的存在空间愈益局促蹙蹙。之后欧洲殖民者的风尘足迹更深入非洲、亚洲和南美洲地区，传教行医将治疗躯体疾病与拯救灵魂结合在一起，教堂与教会医院便成为西方文化在非西方国家的标志。^①这一过程，梁启超曾语之“莽莽欧风卷亚雨”，可谓描画都尽。

西医的这种“政治正确性”，不仅为西方人所簇拥，甚至支配着很多急欲摆脱殖民和半殖民不堪境遇的东方社会，比如中国。在近代中国社会保国与保种以及民族国家建设的终极目标下，时人多指责中医缺乏“近代政治理念”，不但不能成为救治社会病症的“社会医学”，也有碍科学与民主的传播。按余岩的说法就是：“旧医乃日持其巫祝讖纬之道，以惑民众；政府方以清洁消毒，训导社会，使人知微虫细菌，为疾病之源。而旧医乃日持其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夏伤于暑，秋为痰疟等说，以教病家，提倡地天通，阻遏科学化。”^②这种从笔底流泻出来的文字反衬出时人的忧怖交集，似乎中医与西医，不仅关乎“迷信”与“科学”的二元对立，也是“亡国”与“救国”的政治分水岭。因此，对志在收拾时局的人来说，中医必然成为被剪芟的对象，由此而有1929年的第一次“废止中医案”。中医的“存”与“废”，表面上围绕中西医理的分歧争议，中医是“玄学”还是“科学”等等。但其底里毋宁是，“中医”与“西医”、“旧医”与“新医”的核心区别乃在于是否拥有完备的“卫生行政”能力，而总是以分散状态面对病人个体的中医，根本达不到“强种优生”的现代政治目的，换言之，中医不能为现代政治所用。中国的现代政治由是选择在西医的基础上搭建了卫生行政制度，而国家在医疗行政上的现代设计蓝图可以说完全出自西医手笔。在西医的这一天罗罩

① 参见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决议“废止中医案”原文》，《医界春秋》第34期，1929年4月10日。

下,中医成为屡遭摧锄的对象,转为国家现代卫生权力结构中奄奄无气的一方。其自救、其抗辩、其谋求合法化的种种努力,都很难逃脱中医传统被全盘置于西医控制之下的命运。

这一命运不唯中国的传统医学所是。对于同时期获得殖民独立的新国家之传统医学,大体都经历了类似的丕变。一来,这些新获独立的国家,要“揖美追欧,旧邦新造”,往往选择复刻西方经验,建立以西医的行政化形式配合以国家意识形态加以垄断的现代卫生制度;二来,即便这一卫生行政制度不是自发选择,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20世纪50年代,由西方国家启动的发展援助计划也附加了援助条件,要求获得殖民独立的新国家建立系统的生物医学模式。之后的半个多世纪,西方生物医学进入并取代地方性医学成为医学跨文化传播的主旋律。在全球医学市场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生物医学劲气辐辏,风气播染之下被视为普适性医学,由此贴上现代性与进步的标签,拥有“政治正确性”,成为发展中国家戮力追蹶的对象,以生物医学为主臬,引导本国医学走向药物生产工业化与医疗保健生物医学化。而以此律彼,在相当多的后发国家,生物医学之外的地方性医学被普遍认为仅具文化研究的价值,临床应用意义较少。各种传统的地方性医学作为生物医学的“替代”或“补充”,只在极少的场合使用。^①

时势比人强,在二战结束后的20余年间,国际社会新生国家大多自上而下建立了西化的现代医疗卫生体制。但这一现代的医疗服务体系,或者说医学—工业复合体,往往需要精心设计的临床试验、庞大的医疗辅助机构以及大量的药物供应,这一切无不意味着高昂的医疗费用。而对于刚获政治独立的国家来说,经济水平普遍低下,高昂的医疗费用如同一种板结的地块,使卫生体制支持下的西医短时间难以惠及社会的大多数人口。于是在整个发展中国家,增加医药的可及性(access)成为最迫切的使命。与此同时,在西方世界,“二战”后的30年,高科技医学的发展使得可应用的医学手段大大丰富,但医疗费用和医疗开销也急剧膨胀,以至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欧美各国普遍都在寻找限制医疗费用的方法,可以说,

^① 张有春:《人类学视野下的民族医学疗效评价》,《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50—56页。

决定西方世界下一时期医学政策的关键,是高科技医学的费用问题。^①而在社会层面,医学反文化(**medical counter-culture**)思潮的兴起和涌荡也使得科学医学的机构和权力都受到了攻击。

因此,无论在先进还是后进社会,西医在现代卫生体制中的垄断地位都没能彻底吞噬传统医学的存在和力量。在不同社会,于是逐渐生发出“两种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孳杂”。^②新医与旧医、西医与传统医学的“反复”和“孳杂”浮现在不同国家的社会土壤上,反映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医学的山重水复。

由此,我们可以说医学的全球化传播历史,凸显了医学与国际关系的复杂历史纠葛。在这一背景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联合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院、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研究中心,于2017年11月17日至18日召开“医学与中国外交”学术会议,以及2018年5月11日至12日举行“医学与国际关系”国际会议。两次会上,来自医学、国际关系、公共卫生、法学、历史学以及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对这一议题进行了自由而有用、有趣的讨论,也由此激发并成就了这期《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的主题。应该说,围绕医学与国际关系,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代,有太多有待探索的领域与课题。

本辑的出版和一些相关课题的研究,除了所刊论文专门论及之外,还得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资助。对上述单位和项目资助方,本刊编辑部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① 罗伊·波特(Roy Porter):《剑桥插图医学史》,张大庆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217—221页。

②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14页。

目 录

编前语 /秦 倩 1

16—17 世纪欧洲科学家视野下的中国医学 /高 晞 1

传统医学在西方：政治、职业化与医疗行业 /秦 倩 19

传统医疗在日本的复兴和发展

——以“标准”和“规范”为着眼点 /于佳佳 39

外来疾病与文化冲击：以梅毒东传为例 /于赓哲 56

20 世纪上半叶跨国医学机构在中国

——以协和为例 /蒋育红 85

近代民族主义浪潮中的教会在华医疗事业

——以 20 世纪 20 年代广州博济医院为例 /叶丹丹 崔军锋 105

健康权保障：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到全球健康治理 /唐贤兴

马 婷 123

跨国公私伙伴关系的兴起及原因探究 /丁梦丽 刘宏松 143

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动力的技术转向 /苏静静 张大庆 170

中国对外医疗援助政策效果研究

——以上海援摩洛哥医疗队为例 /沈玮哲 191

中国、越南、老挝卫生合作的外部环境分析 /朱 思 祝雯珺

曹 俊 黄霞燕 237

- 中医外交：以中国与朝鲜半岛医学交流史为例 /赵志伟 田永衍 256
- 现代中医外交实践及运用策略探讨 /卞跃峰 宋欣阳 270
- 中医药国际化与医学外交 /徐晓婷 沈远东 286
- 中医药国际服务贸易与中医外交 /杨逢柱 301
- 《黄帝内经》中山水文化隐喻探究 /张永康 赵心华 328
- 从中国领导人在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看中国—东盟关系构
建、演变和趋势 /朱美琳 王丽琴 340

16—17 世纪欧洲科学家视野下的中国医学*

高 晞**

【内容提要】 17 世纪中医西传,曾引起世界著名科学家如波义耳和胡克等人对中医技术的关注与研究。在欧洲科学家视野下的中医是一门怎样的知识与技术?是新术还是旧技?他们是如何理解东西方医学间差异的?他们是如何在既存的知识框架下阐述中医的?发生在 17 世纪的东西方医学对话,对今天中医走向世界有何启示意义?

【关键词】 中医西传,波义耳,胡克

【Abstract】 The westward spread of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17th century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world famous scientists such as Boyle and Hooke. What kind of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was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vision of European scientists? Was it new or old? How did they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medicine? How did they elaborat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ir existing knowledge? What i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ialogue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o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today?

【Key Words】 Westward Spread of Chinese Medicine, Boyle, Hooke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专项基金项目“十九世纪前欧洲科学家和汉学家视野下的中医西传研究”(项目编号:2018VJX066)的阶段成果。

** 高晞,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引言

16 世纪由欧洲传教士、旅行者和商人开启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一度引起欧洲知识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强烈好奇心,他们称东方为“异趣之地”,将中国的事物视为“奇趣异闻”。在他们从中国带回欧洲的各种异域珍宝如茶叶、瓷器、药物和植物标本等物品之外,还有诸多大部头多卷本的汉文书籍。1575 年西班牙奥古斯丁会修士马丁·德·拉达(Martín de Rada, 1553—1578)访问福建后写下《记大明的中国事情》:“我们得到各种出版的学术书籍,既有占星学也有天文学的,还有相术、手相术、算学、法律、医学、剑术,各种游戏,及谈他们的神的。”^①1586 年,西班牙奥古斯丁会另一位修士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 1545—1618)在《中华大帝国史》中谈到拉达返欧洲时带了数量可观的汉籍,其中有“许多医书和本草书籍,包括上古和后世医家的著作,内容涉及他们如何观察疾病、治疗病人的疾病,以及如何制造药剂对付疾病和人体虚弱。”^②此外,当时主宰东西方贸易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会留给员工一个小金库,让他们购买少许东方物品回到欧洲交易,作为补贴。当船回到阿姆斯特丹港时,员工会将其在福建购买的书籍,在当地出售,这类图书被称为“阿姆斯特丹论文集”,分散在欧洲各图书馆和私人收藏中,其中有一大部分被牛津大学博德利安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收藏。因为语言的障碍,西方图书馆员根本无法甄别这些是什么书。1687 年整个夏天,一位来自南京的中国人沈福宗受牛津大学博德利安馆馆长、东方学者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③之邀在牛津大学整理该馆所收之中国书籍,编写目录。沈福宗发

① 博克舍编:《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211—212 页。

② Edit by Sir George T. Staunton, 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and Mighty Kingdom of China and the Situation Thereof*, London; printed for the Hakluyt Society, 1853, p.135.

③ 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 1636—1704),牛津大学博德利安图书馆馆长,精通土耳其语、阿拉伯语、马来西亚语、波斯语、希伯来语,亦通汉语,英国宫廷东方语言翻译,向欧洲介绍围棋和中国象棋。他与沈福宗交往的这段经历最受学者关注,参见 William Poole, “The Letters of Shen Fuzong to Thomas Hyde, 1687—1688,” *The Electronic British Library* (转下页)

现图书馆的中文书中“有一些是儒学著作,但大多数是医学书籍。”^①据后人统计,17 世纪前牛津大学博德利安图书馆所藏的中医书籍有:《徐氏家传捷法针灸》《编注医学入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黄帝内经灵枢》《新刊古今医鉴》(万历中金陵书林周日校刊)《医方考》《本草蒙筌》《太医院补遗本草歌诀雷公炮制》《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新刊万病回春》《增定便考万病回春善本》《补遗雷公制便览》《小儿良方全婴》《丹溪心法附余》《药方》《类编伤寒活人书括指掌图论》等,这些书刊由金陵书林唐少桥刊、金陵书林富春堂刊、建阳书林刊和金陵书林周日校刊等书坊刻印。^②沈福宗还在巴黎帮助过巴黎皇家图书馆馆员、东方学者、地图绘制者、旅行作家、医生泰弗诺(Melchisédech Thévenot, 1620—1692)整理过该馆所收之中文书籍。^③1682 年沈福宗抵欧洲时,还随身携带了四十余部汉籍。在罗马教皇召见时,他将这批图书赠送给了梵蒂冈图书馆,成为该馆拥有的早期汉籍藏本。^④目前该馆所藏中文书籍中有 32 部医学文献,其中 15 部是明末清初的刻本,是否有沈福宗所赠之书,不得而知。^⑤

显然,无论是商人或是传教士,在选购汉文书籍时,除中国经学文献,他们都偏爱医学书籍。但是这些以中文描绘的知识图景对欧洲学界,尤其是医学家和博物学家来说,却是一个难以进入的世界。所以,在 17 世纪初期欧洲知识界关于中国文化与知识的信息还要依赖于传教士的报道和旅行者的游记,以及由欧洲境内传教士根据不同报告编写的中国书籍,其中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的《中国新地图志》(1655 年)、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曾德昭(F. Alvarez Semedo,

(接上页)Journal, 2015 articles, <http://www.bl.uk/ebj/2015articles/article9.html>, 登录时间:2018-05-27。关于沈福宗与欧洲学界的交往研究可参见韩琦:《17、18 世纪欧洲和中国的科学关系——以英国皇家学会和在华耶稣会士的交流为例》,《自然辩证法通讯》1997 年第 3 期,第 47—56 页;潘吉星:《沈福宗在 17 世纪欧洲的学术活动》,《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7 年第 3 期,第 1—8 页。

① Edited by Thomas Birch, Robert Boyle, *The Works*, London, 1772, Vol. VI, pp.574—575.

② David Helliwell, *Chinese Books in Europe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27 June, 2017.

③ Nicholas Dew, *Orientalism in Louis XIV's France*, Oxford, 2009, pp.205—233.

④ 潘吉星:《沈福宗在 17 世纪欧洲的学术活动》。

⑤ 此医籍书单由梵蒂冈图书馆余东女士提供。

1585—1658)《大中国志》(1655年)和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 1601—1680)的《中国图说》(1667年),他们对中国的描述构成欧洲汉学家、哲学家和博物学家研究中国的基本素材。^①

上述著作中多少会涉及一些中国医学的记录,但没有医学专著和译著。明末清初,在东方传教与工作的欧洲人开始着手编译中医书籍,出生于波兰御医家庭的传教士卜弥格(Michel Boym, 1612—1659),被认为是第一个研究并向欧洲介绍中国医学秘密的欧洲人,^②1652年至1653年他以拉丁文编写图文并茂的《中国植物志》,1656年在维也纳出版。这是欧洲出版的第一部中国植物学专著。其中收录29种生长在东南亚和中国的动植物,有柿子、榴莲、椰子、槟榔、芭蕉、荔枝、蒲桃、波罗蜜、芒果、枇杷、臭果、胡椒、桂皮树、大黄、茯苓、生姜等植物。对每种植物,卜弥格都详细描述其葡萄牙或拉丁文和中文名称、生长区域、形质特征、药物制作方法、治疗的疾病和销售情况。1663年该书被泰弗诺收录在他编辑的法文版《旅行导论》(*Relations de Divers Voyages Curieux*)中。同时卜弥格开始将中国脉学理论、中国最早的舌诊专著——元代《敖氏伤寒金镜录》翻译成拉丁文。1659年卜弥格不幸病逝于广西,他翻译的医学手稿由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 Couplet, 1623—1693)带到欧洲传教士来东方的中转站区——巴达维亚(即今马来西亚的雅加达)。而在此地工作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德国医生、博物学家克莱耶尔(Andreas Cleyer, 1634—1697)自1670年代起就一直在编著一部中国药物志(*The Chinese Herbarium*),同时也在撰写关于中医的专著,他邀请柏应理与他合作,柏应理向他展示了卜弥格的手稿。^③1671年一部讲述中医脉学的《中医秘密》(*Les Secrets de la Médecine des Chinois*)在法国横空出世,标题说这是一位法国人从中国带回来的技术,这是在欧洲出版的第一部关于中医的专著,近代学者研究认

① 卫匡国和曾德昭两者曾有中国生活与传教的经验,基歇尔未到过亚洲。但他在1667以拉丁文的《中国图说》(*China monumentis, qua sacris qua profanis, nec non variis naturae & artis spectaculis, aliarumque rerum memorabilium argumentis illustrata*)在欧洲影响非常大,1670年出版法文版,之后有德文版和英文版。

② 黄一农:《锈斑蚪与〈王子皈依记〉》,《科学人》(台北)2002年第10期,第32页;张西平:《交错的文化史——早期传教士汉学研究史稿》,学苑出版社2017年版,第412页。

③ Edited by Jerome Hendricks, C.I.C.M. Philippe Couplet, S.J. (1623—1693), *The Man Who Brought Chinese to Europe*. Steyler Nettetal 1990, p.108, p.117.